

■ 观点四

王者归来: 国企入市愿景 —— 机构新时代之六



◎ 李国旺 银河基金管理公司 市场总监

今年8月以后,中国石化、宝钢、中国银行、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已成为并将继续成为拉升沪深股市指数的主力。统计显示,沪深两市总市值位居前50位的大蓝筹股“吞食”了全部的新增财富:总市值50强新增市值达到6478亿元,高于沪深两市1300多个个股“创造”出的财富总额。但是新增财富并没有为普通投资者分享,因为市值50强个股的流通市值增加额仅为931亿元。特别是11月以来新增财富收入囊中,国资部门成为股市冲击2000点最大受益者。

国企资金可以规范入市,使整个市场的利益格局和影响力在11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国企资金入市是大势所趋,但要求国企资金规范入市,实质上改变了过去对央企或者其他国有企业事实上的“入市禁止”规则,而国有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获得了政策保障。如果股改顺利完成,加上股权激励机制的设立及国资市值考核等一系列有利于股市政策的顺利推出,国有资金进入股市将为沪深股市提供特别长期的资金供给,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

如果以影响力或者控制力来定义国企,上市公司中的90%以上都可以列入国企的范围。股改后,只要内外因素作用使得股价上升,国企原来非流通的股份实际上也得以同等的升值,虽然要两年后才能真正流通。国企市场价值的提升,有如GDP上升对地方政府政治业绩的作用,因为国有资产在账面上确实是增值了,国有资本实力

■ 转型深圳

“深港创新圈”与“品牌之都”



◎ 魏达志 深圳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未来就是由于新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从而给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变化,人们必须适应产品使用的短暂性、新发明日益增加的新奇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类生活的多样性。

过去十多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异军突起,让我们品尝到了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甜头,领略到了新技术革命给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今天,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深圳当之无愧的第一经济增长点。

目前,高新技术产业是位居深圳四大支柱产业之首的战略产业。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及新能源、生物医药技术、光机电一体化、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产业又占了90%左右。

深圳在建设城市创新体系的过程中,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和先天不足,为此,深圳通过市场机制促成了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形成了“四个90%以上”的格局,使得深圳的城市创新体系具有特别灵活的市场机制和特别鲜明的主体特征: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自去年以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取得了“三个50%”的成效:即2005年全市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488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1年的8%上升到51.1%;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58%;2006年上半年

是增强了。当然,国有企业价值提升的意义并非账面价值那么简单,因为股改,国企不仅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和可以减持的范围内减持股票,直接实现国有企业的升值,而且因为由于国有企业总体资产价格的上升,即使按比例可以入市的实际资金也在增加。

以中国的经济结构,目前还没有能与国有企业抗衡的经济实体,国企的资金如果可以规范入市,即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中最大的机构力量。如果将“金融类”国企另外考察的话,可以发现,以中石化等为代表的企业(往往以财务公司名义进入市场)进入二级市场,将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来的操作或者炒作的概念,代之以资源整合或者行业整合的战略思想。比如宝钢股份上市后,实际上是对中国钢铁行业进行了一次市场化的整合,这种市场化整合是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向,如果可以利用中国资本市场提供的平台顺利完成,可以减少过去通过行政手段“拉郎配”的弊端。今天,许多国有企业是以产业投资或者产业整合的成本效益计算而进入股市的,其结果是成功地以低成本进行了一次产业的大整合。这是

在券商行业中表现最为明显,比如中信证券就利用了行业的困境成功空转并通过低成本购并得以成为行业龙头的。

在沪深股市这轮因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牛市行情中,国有企业由于法人股增值和为二级市场投资带来的积极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股市长期资金的供给方,同时它们又可以通过整体上市、权证、增发等形式不断为市场提供股票等有价证券。因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将是与市场发展与时俱进的最大群体。

综上所述,愿景很清晰:彻底改变了资本市场旁观者身份的国企,既是市场资金的最大提供方,又是市场股票等交易标的提供者,因此对市场的影响也是双重的,既是市场利益的重要分享者,更是市场稳定发展的护法使者。

■ 求索

看拉米打高分 听曼德尔森抱怨

中国在WTO的5年过渡期中表现相当不错,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打了一个A+的好分数,而148个成员对中国的整体评价则是“作为新成员,已经表现得非常好”。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从世贸组织的观察过渡期中顺利毕业。

当然,这些良好的表现也适用于中国的价格控制改革:中国政府逐渐减少了进口关税,从2001年的15.6%降至2005年的9.7%,这已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取消了绝大多数农业补贴和出口退税;正努力建立一个与国家油价市场挂钩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尽管这些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机制相比,还有相当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对于这个已有30年计划经济历史,而且还拥有13亿巨大人口压力的中国来说,这已是一种相当大的社会进步。正如拉米所说,“考虑到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国家,中国政府高层的决策推广到基层需要时间,因此要中国百分之百地完全兑现承诺也不现实”。

实际上,对于正在发生巨大转型的中国来说,改革的动力还不仅仅在于中央政府的决策,而且关键还在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以及民众的意识转变问题。很显然,而今遇到的很多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与之相反的是,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认为,“中国在电信业、银行业、建筑业等市场的开放上不如人



◎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 21COE-GLOPE 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意……5年过渡期即将结束,必须充分执行承诺”,“中国的某些政府补贴、优惠贷款、免费土地等其他补贴形式不符合WTO的相关规则”。

操之过急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把中国带入不是繁荣的社会发展,而是重回历史的长期混乱状态。要知道,西欧花了几百年的历史才建立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刚刚推进了短短的20多年。我并不认为,中国能在短期内快速完成相关的改革步伐,建立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制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3年)道格拉斯·诺斯在他的新作《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再提醒,建立一套规范的、正式的制度安排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要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却是非常困难,因为与之相配套的非正式制度变化总是非常缓慢的。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是最好的例证。

俄罗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套与西方社会相同

■ MBA眼光

中国信念 自信表达



◎ 刘贤阳 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

西方媒体最近报道,说中国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中国大多数警官移植手术使用的是被处决囚犯的器官,但卫生部官员强调,事已获得了死刑犯本人或其家属的同意。这个多年来的争议反映了中西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若按中国人的观念,那就是该报道中所引用的一位中国医生的话,这是件好事,因为犯人起码能够以此举来补偿其部分罪行。西方人则不认同,他们更注重人的基本权利。

《纽约时报》前不久刊登了一篇名为“这决不会是为了爱”(This Can't Be Love)的文章,介绍生物学的发展趋势,试图解释一种自然现象:为什么有些动物,如螳螂、蜘蛛、蝶等,交配完后,雌性昆虫就会把雄性吃了。据生物学家解释,这体现了动物延续后代的本能,因为雌性在繁殖后代时,需要消耗大量的体能,吃了自己的配偶,也就获得了完成这一艰辛任务所需的营养,从而增加了繁衍成功的机会。可是,雄性如此行为,到底是无恨无悔、甘愿为传种接代而壮烈献身呢,还是色胆包天,为欲而死?那就是最新研究试图要解答的疑惑……

此类讨论是以生物学的重要假设为前提的:生物行为皆受支配于其最根本的本能——使种族得以保存和繁衍,而这又是物种进化的结果。自然界曾有数量巨大的物种存在,但后来大多数都灭绝了,只有很小部分得以延续和发展。为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多数物种都会大量地繁殖后代,但只有其中的小部分存活了下来,而那些能存活的,是因为它们由遗传而继承了先祖通过后天调整所获得的优势特征。这是达尔文学说的基本要点。

今天,西方学者也以此观念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人类延续至今的某些行为,认为这是古人类生存本能的遗传。

人类最后脱离了动物界,不仅能以自身调整来适应环境,也通过对环境的改造,提高了自己的生存能力。他们为了征服自然,创造了工具,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从根本上说,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经验总结和经验累积。由于各个人类族群的居住环境差别极大,所创造的工具迥然各异,所形成的文化五彩斑斓。在越是恶劣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文化,也就更能体现物种生存本能。

很多民族的文化习惯、社会行为、价值观,若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会难以理解,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又有其合理性。假如了解中华民族生存客观历史,就比较能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征了。中国自然环境中恶劣,中华民族历史上所经受灾难之深重,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大部分区域的土地,水文、气候都为不利,自然资源紧缺,历史上多次地出现洪水、干旱、瘟疫、饥荒、战争等社会性动乱,导致人口锐减。史书上有十四次人口死亡过半的记载。这一

的宪政与市场制度,但实际上却走向了一个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地方政府与那些工业寡头们勾结,从中央政府谋求更多、更好的政策或者资金。这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控情形下经济发展,导致的不是社会的繁荣,而是致命的发展硬伤。

必须看到,发达国家要求中国进行价格控制改革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全面打开中国市场,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没有考虑中国改革的实情。如今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收获阶段,需要的是更多实质性的社会利益。因此,如果过分苛求中国让步,结果可能很糟。比如,在中国还没有具备一定竞争力的情况下,完全开放电信业、银行业等,必然会遇到政府和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要知道,完全开放的市场并不存在,无非各自的保护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曼德尔森抨击道,“中国给电信运营商发放了16000个许可证,但欧洲企业只拿到了5个”。但需要反问的是,在欧洲如此

众多的电信运营许可证中,中国又有几个呢?孤军奋战的华为不是正因始终无法进入欧洲电信的高端市场而面临公司转型的困扰吗?

当然,我们需要用一种更加务实的、从国情实际出发的双赢眼光来看待改革发展。实际上,中国现在担心的恰恰不是价格控制问题,更多的还是价格控制放开之后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定价上的一些政策漏洞,建立了一种垄断的定价制度,比如高得吓人的房地产价格、银行卡的年费以及跨行收费政策、卡拉OK的版权费问题,还有最近邮政资费的上升等等。

因此,如果说需要改进的、或者说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还有赖于更加稳健地推进政治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以求建立一套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一旦政治行政管理体制理顺,市场的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当然,在这期间,法治制度的完善得加快步伐,比如建立价格听证会制度、反垄断法制度等。



严酷性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坚韧性格,如节俭、勤劳和巨大的痛苦忍耐力,也形成了强调种类延续本能的传统观念,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

在如此环境下产生的中国文化,就不像西方那样地鼓励积极思维,而是提倡忧患意识,是“死于安乐,生于忧患”;也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推崇个人,强调个人权利,而是着眼群体意识,家庭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社稷为重,是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颂扬。

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不是西方观念的公平和公正,而是群体利益高于一切,是因为历史上生存环境的严峻,才会有文化中突出的群体特征。正是因为家族延续在中国人观念中之重要,才有满门抄斩这一残酷惩罚。传统文化中的残忍性,归根结底不过是环境严酷性的体现。

在今天全球化的趋势中,文化也在走向世界大同。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科技力量,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科技的领先地位,全球化也就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这一影响蕴含在电影、电视剧、音乐等的欣赏中,是通过政治学、经济学等知识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在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不知不觉中,世界接受了以西方价值为基准的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

这种文化大同的趋势,

推动各民族的沟通和世界的稳定。但是,若想把某文化价值观一概而论地强加于差异化的世界,那就不免是唯我独尊的霸气了。

几年前我参加美国管理学会的某个年会,一位新当选的主席在就职演说时,突然谈到在中国、印度等国家中广泛存在的童工问题,并提出谴责。当时,我就很反感,会后与另一印度籍的教授当面去提抗议。我认为,在这样的会议中提出这一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是不恰当的。那印度教授就更直白,她说这是个很难有统一答案的道德问题。那些贫穷国家小孩,到底是谁使他们处于饥饿状态更人道呢,还是有一份工作,从而能有饭吃才更为人道?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西方也是倍受争议的,其所反映的也是文化价值观的差别,是源于各国不同的客观环境和历史经历。西方国家其实混淆了一个本是很简单的道理:在社会面临着人口过剩的危机时,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当我们必须作出二择一的决定时,到底哪一种方式更为人道:是把胚胎在尚未形成生命前就从母体内拿掉呢,还是像古代那样让人口自由繁殖,再以大自然的法则,通过战争、疾病、饥荒,以在人口与资源间重建平衡?

我真心希望,随着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人也应该随之增添充分表达自己信念的自信和勇气。

■ 排沙简金

别误读了“蓝海”



◎ 王育理 管理专家 首钢发展研究院 企业所所长

韦尔奇的“公司无边界”,是一种强者思维,也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操作。随着GE的成功,引发了持续的理论概括热。敏锐的学者和观察家,则看到了“无边界”的理论意义,分别提出了许多种理论概括。很多人在去年和今年的大部分时间沉浸在《蓝海战略》所描绘的执掌行业牛耳的豪迈之中,可是《长尾理论》在今年年末所掀起的小众市场的利基集成,又使人看到了做企业的另一番境界。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却反映了企业思维的真实状态。不管怎样,只要企业家选准了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一种强势企业思维就跟着成型了。

《蓝海战略》与《长尾理论》,都是基于数字观察到的符合统计规律的现象:公司无边界。然而,两种思维的侧重点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一个抓住了短促的上端(头部),一个抓住了长长的尾部。

《蓝海战略》一书的两位作者金伟灿博士(W. Chan Kim)与莫伯尼博士(René Mauborgne),任教于欧洲商业管理学院(INSEAD),为极负盛名的策略与管理教授。他们都经过20年的研究,对100多年间30多个产业150多个案例对比分析。结论是,在新推出业务过程当中,86%是投入红海业务,14%是蓝海业务,而蓝海业务最后达到总利润61%。

统计数据给了金伟灿信心,让他撇开86%的红海业务,而专注于那14%的蓝海业务。专注产生硕果。14%的蓝海业务,之所以能够占有61%的利润,完全在于这些公司的一种价值创新。现实中主要有两种创新,一种是随机创新,很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另一种是系统创新,有一定思维方式和范式,有一定理论框架,有一定分析性框架,把风险最小化。金伟灿看重后一种创新。

金伟灿还着重区分了技术创新与价值创新。技术创新不等于价值创新,而价值创新必然包含技术创新。如果问个人电脑、录像机、MP3、随身听等产品的发明者是谁?恐怕能够答得上来的,只有随身听,是由索尼发明的。而其他产品的发明者,却鲜有人知道。因为索尼不仅仅在技术创新,而且把该技术成果大规模市场化,实现了价值上的创新。《蓝海战略》并不是说非要第一个创造什么,而是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获利,如何赚钱。

“价值”和“创新”同样重要。创建蓝海成败关键并非尖端科技的创新,也不是“进入市场的时机”,而是“创新”和“实用”、“售价”和“成本”两组的密切配合。《蓝海战略》的核心是如何通过价值创新实现垄断。作者鄙夷红海竞争,他们所关注的,就是那些拥有14%的蓝海业务,以及掌控了61%的利润的企业。其他企业虽然占了业务总数的86%,却只能为39%的利润份额而奋斗。

实现价值创新的途径是多维的。比如,跨足另类行业,本行业里面的细分市场,探讨顾客的连锁性,互补产品和服务,理性诉求挑战感性诉求,把握住长期发展趋势等等。所有产业都会面临行业内部市场细分与外部趋势转变,从而影响到业务经营。能够把握住先机,奠定技术垄断的基础,成为创造蓝海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范例不少。由于网络科技使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音乐,Napster等分享音乐档案的程序,在熟谙互联网的乐迷之间已形成一个非法免费分享音乐的全球网,迈向音乐数字之势非常明确。而苹果计算机的iPod等播放数字音乐的袖珍MP3机器的风行,又加剧了这种趋势,于是苹果计算机公司在2003年一举推出iTunes网络音乐商店,果然大受欢迎。

可是《蓝海战略》一流行,便在中国招致批判。更有人以为,《蓝海战略》无非是新瓶装旧酒,是专喂投机者和懦夫的毒药。我不同意这样的解读。作为一种通过开拓性技术,实现价值创新,从而保持差异化、低成本蓝海,具有经济活动的经久意义。不过,它的助融是,只专注于14%的高垄断性业务,而置86%的“红海”业务于不顾。执掌行业牛耳只是遥远的梦想,过好现在的生活,生存下去,是许多企业更为紧迫的问题。